



曹聚仁作品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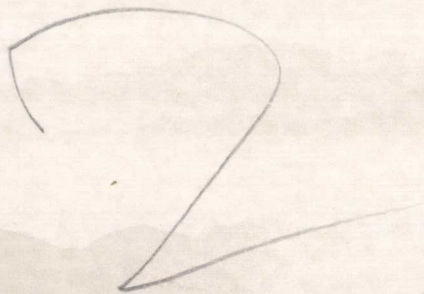
曹聚仁 著

# 我与我的世界

曹聚仁回忆录 [修订版]

## 浮过了生命海

(下)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曹 聚 仁 作 品 系 列



# 我与我的世界

曹聚仁回忆录 [修订版]

# 浮过了生命海

(下)

曹聚仁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与我的世界：曹聚仁回忆录（修订版） 浮过了生命海 /  
曹聚仁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1.4  
（曹聚仁作品系列）  
ISBN 978-7-108-03526-4

I. ①我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曹聚仁（1900~1972）—  
回忆录 IV. ①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154946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 卫 纯

封面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 
（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）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28.5

字 数 709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7,000 册

定 价 69.00 元（上、下册）

## 九四、大众语运动

前几年,此间一家出版社,继当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《新文学大系》之后,继编了《新文学大系续集》,因为史料缺乏,编辑人常识不够,编得有些乱七八糟。(他们甚至连谁曾参加编辑工作,都不肯告诉读者知道呢!)不过,其中倒编了“大众语运动”专辑,这些史料,告诉一些当时的实情,把一些故意歪曲事实的报道打碎了。

1934年夏天,一个下午,我们(包括陈望道、叶圣陶、陈子展、徐懋庸、乐嗣炳、夏丏尊和我)七个人,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喱饭店,有一小小的讨论会。我们讨论的课题,针对着当时汪懋祖的“读经运动”与许梦因的“提倡文言”而来(汪氏曾在《时代公论》发表文言复兴论,许氏有“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”之论)。我们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够彻底,因为我们所写的白话文,还只是士大夫阶层所能接受,和一般大众无关,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。同时,我们所写的,也和大众口语差了一大截;我们只是大众的代言人,并不是由大众自己来动手写的。因此,大家就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,并决定了几个要语,先由我们七个人轮流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上发表意见,我们的主张,大致是相同的;至于个人如何发挥,彼此都没受什么拘束的。事先,由我商得了《自由谈》主编张梓生兄的同意,敞开《自由谈》地位来刊载这一课题的论文;那几个月的《自由谈》就成为大众语的讲坛。当时,由抽签得了顺序,陈子展兄得了头签,笔者第二,以下陈、叶、徐、乐、夏先生这么接连下去。序幕的实情如此。(近年我看了许多谈现代文坛掌故的,有的说陈子展所提出,由鲁迅奠定基本观点。有的说是宋阳〔即瞿秋白〕所倡导的。王瑶的新文学史又说是鲁迅所领导的。那就该看看大众语运动专辑再说了。《鲁迅全集》俱在,他从来没说过领导大众语运动的话呢。)

陈子展兄，担当了开场的锣鼓，他就提出“文言—白话—大众语”这一课题，把“大众语”喊了出来；至于积极的主张，还待大家来分别补充的。我既轮上了提出了主张的任务，因此，写了《大众语文学的实际》这一短论。我（我们）所提出的基本条件是：

一、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写给大众看大众听的，而是大众自己所写的。以往的古文和白话文，可说是知识分子（士大夫）的专利品，运用文字这工具的人，至多不过占大众百分之五。现在要使大众来运用这工具，由大众来创作大众语文学，所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，就是要从农民、工人、店员中训练起大众作家来。

二、语言和文字绝对一致，在最近的将来还是不可能；除非纸片上收音成为事实。大众语文学的基础工作，先要在方言文学上奠定基础。大众以往确乎不以文字来创作，而以语言来创作，自古迄今，日进不已。我们应该发展多元的方言文学，即是使大众接近笔头，由此逐渐可以完成一元的大众语文学。

三、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形式问题，而是意识问题，我们并不必“言必雅驯”，却不妨如“引车卖浆之徒”，大胆采用口头语。

四、我们要重新编订活的大众语文辞典。

大众语运动，既已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开了场，桴鼓相应的，就有《太白》、《芒种》、《文学》和《社会月报》；那两个月的上海文坛，都在注意这一课题。我呢，和张梓生兄取得了密切联系，同时和语文学专家们作文字上的磋商。当时，除了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我们，回了我两封信，还特地写了专栏：《门外文谈》，做建设性的建议；此外，黎锦熙、胡适、吴稚晖三先生也写了回信给我。吴稚老的回信，用毛边纸写，长达一丈二尺余，共四千多字，题为《文学不死，大祸不止》，煽动性十分重。（可看“大众语运动”专辑。）这封长信，首先在《自由谈》刊出，接着又刊在《社会月报》，后来，《文学》月刊也刊了全文。稚老的信，寄到我手，陈望道师看了，高兴得跳起来。可见这封长信的魔力。

鲁迅先生回答我的信中,他一开头就说:“一、汉字和大众,是势不两立的。二、所以,要推行大众语文,必须用罗马字拼音(即拉丁化,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,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),而且要分为多少区,每区又分为小区……写作之初,纯用其地的方言,但是,人们是要前进的,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,就只好采用白话,欧字,甚而至于语法。……三、普及拉丁化,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……现在能够实行的,我以为是(一)制定罗马字拼音……(二)做更浅显的白话文,采用较普通的方言……至于思想,那不消说,该是‘进步’的;(三)仍要支持欧化文法,当作一种后备……”他的观点,比我们更积极更具体呢!

不过,鲁迅先生在《门外文谈》中所说的更富启发的意义。他首先解说:“字是什么人造的?”虽说传说中指出“字是仓颉造的”;但他认为做《易经》的人,比较的聪明,说:“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接着,他就把古人结绳的道理说了:“我们那里的乡下人,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,就在裤带上打一个结。‘八卦’之流,三条绳一组,都不打结是‘乾’,中间各打一结是‘坤’罢?……”如今,“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‘打结字’,用一条横绳,挂上许多直绳,拉来拉去的结起来,网不像网,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。我们上古的结绳,恐怕也是如此的罢。”

鲁迅先生又从实物上看见那最古的文字(甲骨和钟鼎文),指出写字就是画画。“象形,‘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’”。接下来,讨论“古时候言文一致么?”的问题。他认为“中国的言文,一向就并不一致的,大原因便是字难写,只好节省些。当时的口语的摘要,是古人的文;古代的口语的摘要,是后人的古文。所以我们的做古文,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,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,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,懂的也不多的,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。你想,这难不难呢?”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。“……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,所以

它就有了尊严性,并且有了神秘性。中国的字,到现在还很尊严,我们的墙壁上,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‘敬惜字纸’的篓子;至于符的驱邪治病,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。”“我们中国的文字,对于大众,除了身份,经济这些限制之外,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:难。单是这条门槛,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,就不容易跨过。跨过了的,就是士大夫,而这些士大夫,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,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。”这么一说,大众语运动实在太重要了!

当时,吴稚老的长信,富有战斗的气息,有如张翼德的长矛守在长坂坡上,横扫无敌,我已说过了。当大众语运动正在低潮当儿,稚老的一臂之力,把我们都振奋起来。黎锦熙先生,他是语文运动的主将,他的长文,虽说富有学究气味,却是很细密的。胡适先生的文章,指出通俗文章的不容易写,要我们着重自己的实践,要拿出货色来。这也说得很对。因此,主张文言复兴的黯然无色。我们倒和提倡语录体奉袁中郎为宗匠的林语堂先生对垒起来了。

我还是回头讲一讲鲁迅先生的《门外文谈》所启示的建设性观点。他首先提到“不识字的作家”,在人类没有文字以前,或许十万年二十万年前,早已有了作家了。他说:“……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,我还有话说。我想,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,就有了创作的,可惜没有人记下,也没有法子记下。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,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,为了共同劳作,必需发表意见,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,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,都觉得吃力了,却想不到发表,其中有一个叫道‘杭育杭育’,那么,这就是创作;大家也要佩服,应用的,这就等于出版;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,这就是文学;他当然就是作家,也是文学家,是‘杭育杭育派’。(稚老曾经用‘杭育’作为科学周刊的刊名。)不要笑,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,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,这正是其一。就是周朝的什么‘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’罢,它是《诗经》里的头一篇,所以吓得我们只

好磕头佩服,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,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作一首白话诗,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,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。‘漂亮的好小姐呀,是少爷的好一对儿!’什么话呢?”他又指出希腊人荷马(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)两大史诗,也原是口吟,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。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里,“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,因为比较的优秀,大家口口相传的”。“东晋到齐陈的《子夜歌》和《读曲歌》之类,唐朝的《竹枝词》和《柳枝词》之类,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,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,留传下来的。这一润色,留传固然留传了,但可惜的是,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。到现在,到处还有民谣,山歌,渔歌等,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;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,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;他们,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。”这些话,都是启示了大众语运动的真正意义。

鲁迅先生也提到清末劳乃宣、王照、吴稚晖他们的简字运动,这就替大众开了创作的新路子。他说:“那么,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,学一点拼法和写法,除懒虫和低能外,就谁都能够写得出,看得懂了。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,是写得快。”他又指出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那么愚蠢。他说:“由历史所指示,凡有改革,最初,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。但这些智识者,却必须有研究,能思索,而且有毅力。……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,……”

## 九五、一幕对话

在大众语运动中,我曾写过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,题为《一幕对话》,副题为《关于大众语的实际》。“大众语运动”专辑中,未见收

人,我在这儿重说一遍。

地点——金城大戏院。

人物——三个看客:甲、大学教授,乙、从乡村来的小学教师,丙、乙的姑母。

时间——《渔光曲》开演前三刻钟。

丙——快开演了吧?

乙——姑老太太,还早得很呢!院子里规定两点半开演,现在大约还差三刻钟。

(甲将《渔光曲》说明书递给乙。)

甲——(对乙)老哥,你先把《渔光曲》本事念给她老人家听听,让她老人家先留一个底子,看起来格外够味些。

(乙取本事,照文句念下去。)

乙——姑老太太,你听:

“东海,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东海——二十年前的某一个早晨,当阳光刚从耸翠的东山上站起来,朝阳映着动荡的激流而交织成斑驳的锦波中。我们的渔人们,在海上悠扬地唱着很好听的渔歌——那就是流行于东海连三岁的孩子们也会唱的《渔光曲》。虽然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身受的痛苦,但他们却认为那是命运使然呵!徐福,是这个渔人队伍中持宿命论者的一个……”

丙——(摇头)够了,够了!我半句也不懂。老啦,不中用啦!你们说的话,我都不懂啦!

乙——(将本事指点给甲看。)老哥,还是请教你吧!我也不懂了一半,什么“诗情画意”呀,“交织成斑驳的锦波”呀,“命运使然”,“持宿命论者”呀,直把我闹昏了。

甲——(微笑)姑老太太,我来说说看,这本影片,是说:

“二十年前头,东海边上有一家吃渔家饭的老渔户,姓徐名福,一家子住在某渔村破屋里。他们那一村,都是大船户何仁斋的

佃户；那些吃渔饭的人，一年到头，辛辛苦苦，在大海上打鱼捞虾，还是有得吃来没得穿，实在难以过活。他们都相信凡事由命不由人，只好靠老天爷保佑的了！……”

丙——喔，原来这么一回事！（对乙）你们学堂里，不是也读白话文吗？白话文说是像讲话一样，听了就会懂的；怎么你刚才念的那一个本事，“的”呀“的”了一大堆，“的”得我半点也不懂了！（对甲）今日上海也时兴这种白话文吗？

甲——这不关什么时兴不时兴的事。读书人总欢喜摆文人架子，一意要使别人不懂，那就叫做“古雅”。现在作白话文的也是读书人，丢不了那个臭架子，文绉绉的，这么一个调调儿！

乙——那，我又不大懂了。《渔光曲》本事，又不是什么藏之名山的大文章，是在戏院子里发散给我们这些看客看的；这儿有老爷，有太太，有小姐，有店员，有工人，有城里人，有乡下人，还有像我这样半缸醋的读书人；这文绉绉的调调儿，大家看也看不懂，写了，印了，还在这儿散发了，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思吗？

甲——你老哥又想错了。那写本事的蔡楚生先生，他想自己是读书人，这篇本事也是写给读书人看的，读书人看得懂，他觉得很够了；至于一般人懂不懂，他从来不曾想到过。

丙——文章作起来，要一般人都懂，本来也是做不到的。譬如我，他再作得浅近些，我也不大看得懂；说话才是说话，文章总是文章，要说文章就跟说话一样，只怕也是不会有的。不过像《渔光曲》本事这样文文理理的，连念了起来，我都听不懂，实在也没有什么道理！

甲——姑老太太，总有一天文字会跟说话完全一致的。现在，上海大陆商场有一家灌音的小店，十分钟，你就可以灌一片短短的谈话。假使灌音的方法再进步一点，再简单一点，在纸片上可以录音，那就用不着文字了。那虽说是将来的事，可是读书人

真肯想法子把文字和谈话相接近,在现在也并不是不可能的。老实说,你老人家做起《渔光曲》本事来,总比蔡楚生做得有边际,有着落一点。

丙——您说笑话了,哪有我会写《渔光曲》本事的事!

甲——这,半点也不是笑话。法国有一位老富翁,他特地请一位文学家来教他作散文;那位教师告诉他,说的话便是散文;老翁听了,大以为异,以为自己作了几十年散文,他半点也不觉得呢!譬如说,你老人家看了《渔光曲》,你回到你自己家乡去,你总得把看过听过的,告诉左邻右舍的。当你告诉亲友们看过一本题名《渔光曲》的影片,你总得把这本影片的内情,原原本本,说了一遍,还得加酱加油,把那些重要关节,说得活灵活现,把那些听众都迷住了。那时候,便是老人家在作文章了。

乙——姑老太太,他说的话大有道理。清朝末年,有一位研究简字的劳乃宣,他做了知县老爷,教老百姓学会一套简字字母,用以写拼音字;不到一年,连乡下老太婆都会写信了。现在通行一种注音字母,只要学会了拼音方法,各人用注音字母来拼口头说的话,岂不是说话就是文章了!

丙——(她点点头)嗯!不错。

甲——注音字母以外,还有罗马字母,也是一样的。在俄国的东方人,十有八九,都是亮眼的瞎子,苏俄政府编了一种拉丁字母,教他们三个月学会。从那以后,那些瞎子都成为真正的亮眼了。有些到中国来传教的牧师,他们把《圣经》用各种土语译成各式各样的《圣经》,要各地的农民都能看懂他们的《圣经》。注音字母颁布以后,也是教会中人用得最早。(广西也有了苗语的《圣经》。)我还记得明代那位防倭大将军戚继光,他带了一大批浙东义乌的子弟兵,驻防福州;因为语言不通,就叫幕友编了一部《八音字义》,编了一套“柳眉求溪低”的字母,让子弟兵学

起来,这就说得福州话了。后来,替这部书加工的,也是从罗马来的教徒,变成了罗马化,连厦门语都有了新书。这篇《渔光曲》本事,用国语、苏白、广东话三种拼音字印起来,假如看客都学了注音字母的话,那就人人都看得懂听得懂了。毕竟还是读书人不好,学了方块字就不肯学注音字母、罗马字母,又不肯教大家如何拼如何拼,文跟话不能一致,就是这个缘故。

丙——你们说用注音字母来拼音,绍兴人拼他们的绍兴话,苏州人拼他们的苏州话,长沙人拼他们的长沙话,那,大家怎么听得懂呢?

甲——长沙话原是拼给长沙人听的,绍兴话原是拼给绍兴人听的,各人都能用各人的土话来作文章,那是注音字母的第一个用处。另一方面,字母是相同的,注音方法也是相同的,谁学会了苏白,就拼出苏白来,杭州人就拼出杭州话来。嘴上的语言统一了,笔上的文字也就统一了;“话”跟“文”也就慢慢一致了。

乙——您老哥,倒是替方言学在这儿宣教啦!

甲——不,由来国语文学都是从方言文学慢慢儿发展起来的。现在又有人在提倡大众语文学啦,方言文学便是大众语文学的底子。明儿,姑老太太也动笔写文章了,老妈子也动笔写文章了,那才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!

(音乐响起来了,《渔光曲》奏起来了:

“云儿飘在海空,

鱼儿藏在水中,

……

爷爷留下的破鱼网,

小心再靠它过一冬!”)

甲——我们不必说废话了,本事尽管让它文绉绉酸溜溜的,你们听,这歌儿不是跟文一致了吗?

(全场电灯渐熄,《渔光曲》上演了)。

这一幕对话,在当时,不独激动了这影片的编导蔡楚生先生,还引起了电影界的一番讨论。蔡先生和我还通过好几信,他终于认为拼音文字的工作是普及教育的要着呢!

## 九六、《立报》

民国七年,北京大学收过两位旁听生,一位是孙伏园,一位是成舍我;他们后来都是新闻界的霸才。中国新闻史上,也只有五种小型报,一种是北京的《实报》,一种是上海的《立报》,一种则是战时在上饶,后来移到上海去的《前线日报》;又有一种,便是战时在昆明的《朝报》,还有一种便是战时在重庆,胜利后移到南京和上海的《新民报》。此中最杰出的《立报》,便是成舍我先生所首创的。(日销二十万份,开了新闻界的纪录。)

许多人,总是爱把“小报”和“小型报”混为一谈;其实“小报”之中,最接近小型报的如《辛报》、《社会日报》和《铁报》,也还算不得是小型报,它们都不曾进过报业公会;而《立报》、《前线日报》都进了报业公会。我们且听成舍我先生的解释:“……‘小型’报和‘小报’,意义绝不相同。小型报是 Tabloid,他主要原则是要将一切材料,去其糟粕,存其精华。换一句话说,即小型报乃‘大报’的缩影,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,最好都不超过五百字。举凡一般大报所刊载冗长而又沉闷,特别像我们中国若干要人们又长又臭不知所云的演说,是绝对不容许在小型报内全文照登。小型报重视言论,竞争消息,广告图片。总之,除量的方面以外,质的方面,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,更精美,亦即中国所谓‘以少许胜多许’。他的工作重心,在‘改写’与‘精编’。至

于人才的储备,新闻网的布置,绝没有任何一点,可以较最进步、最完善的‘大报’减色。至于‘小报’,通常了解的意义,正即西方所指的‘蚊子报’(Mosquito Paper),不竞争新闻,不重视言论,它只以乱造无稽谣言,揭发个人隐私,为其首要任务,正如夏夜之蚊,到处嗡嗡,扰人清梦惹人厌恶。这种报,当然不能与‘小型报’相提并论。不幸在中国,绝大多数读者,都很容易混为一事。”

关于小型报的故事,成氏举了北京《群强报》的例子。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,已经主编北京《益世报》。可是那时北京四家大报:《顺天时报》、《益世报》、《晨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的总销数,竟不及一家小型报:《群强报》。他看看那张四开报,并无任何特色,新闻都剪自两天前的那四家大报,也没有如上海、香港的小报所有的色情小说,也没有什么副刊,字体都是老四号,排版很恶劣,除广告外,总共不到八千字。这么一份毫无特色的小型报,北京的“引车卖浆”之徒,真几乎人手一纸。胶皮车夫,当没有生意时,便坐在车的脚踏板上,从头到尾,一字一句,细细咀嚼。成氏曾加仔细研究,还问了那些车夫,所得结果,加以归纳,他发现了:第一,它全部新闻,虽剪自各大报,但每条已缩编为几十字,最多也不过二三百字;识字不多的,比较容易看懂。第二,那时白话文运动,刚在开始;这张报,一开头就采用了《三国演义》式的白话体。其中有一栏《说聊斋》,将文言改为白话,就为平民所欢迎。此外,还有一大原因,即报价便宜,大报每份日售银两分或三分,这份报只售铜元一枚,市民易于担负。后来,这份报终于倒掉了。但取其所长的《实报》,却十分成功。

成舍我先生,凭着他在北京办报的经验,对于小型报,颇有兴趣。他从办《世界晚报》起,凭着年青人一股劲儿,跟当局有着斗一斗的勇气。他在北京日子,他那一条命,几乎追随邵飘萍、林白水于地下,幸而从张宗昌的指缝中溜出来。后来,他在南京办《民生报》,又跟汪精卫碰上了。出狱那天,南京宪兵司令部,给他看了必须遵

守的条件：“一、《民生报》永远停刊，二、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，三、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，四、不得在任何公共集会作批评政府的演说，五、以后如离开南京，无论到达任何城市，应向当地最高军警机关报告行止。”这就逼得他非走向上海望平街的路子不可了。（他在北平的《世界日报》和南京《民生报》先后被封，他要办报的话，只有上海这一市场了。）

据成氏说：“……我结束了《民生报》，到达上海，准备作短期休养。有一天，几位上海同业朋友，偶尔向我谈及《民生报》夭折可惜，有人问，上海能不能产生一张和《民生报》相似的小型报；当大家听了我的详细解答时，立即决定，在上海集资开办。”他又说到他的朋友吴中一先生在上海水上饭店请他吃饭那一天的事。吴氏向他建议，到上海来办报。接着又说：“上海能不能办小型报？如办大报，则在《申》、《新》两大报高压之下，没有百万以上资本，恐怕是不容易和他们斗争的。”成氏当时同意吴氏所说没有巨资难办大报的说法。他就说：“像我们这种职业报人的经济力量，在上海只有创办小型报，或能打开一条成功途径。”他除强调这张报必须“立场坚定，态度公正”而外，并从编辑、采访、发行、印刷各方面，指出了若干与当时上海一般报纸不同的做法。他的要点，虽然办一张小型报，但所有规模，必须力求完备。重要新闻绝不能比各大报少，每天更应有几条任何大报没有的特讯。地点必得在报馆中心区（望平街），有整栋房屋，足以容纳营业、印刷、编辑等部分，俾能精神贯注，集中管理。印刷部分，至少应自备两部轮转机，每两小时可出报十万份。在报纸每日销数未达到十万份以前，拒登任何广告。他认为报馆走向成功的三部曲，只有先以全力弄好版面，才可以争取读者，扩展发行，然后各种广告，自能不招而至。他特别指出，小型报篇幅极小，内容要精。在上海，以一张四开报与每日出八大张即等于日出十六张四开的《申》、《新》两报抢销路，一比十六，可想见制胜工作的艰巨。而

此四开小型报，其每方寸地位，应如何加倍宝贵；如果给付费极低、意义恶劣的下流广告，占去一部分，那对于读者，一定印象极坏。因此，他坚决主张不能日销十万份，决不增加张数，也就不刊登广告。

这份小型报，定名《立报》，由成氏朋友们集资十万元，经过了一年筹备，到1935年9月，便在上海出版了。不到半年，销数就在十万份之上了，单单西安一市，就销了三千份，那就不是《申》、《新》两报所能争胜了。出版以后，没刊过一寸广告，那就吓住了望平街上的广告大王了。望平街，狄平子办了《时报》，是一纪程碑；成舍我办《立报》，也是一纪程碑，新闻史上的新页。

关于《立报》的成功，正如成氏所说的“立场坚定，态度公正”和“整个版面，充满了动的精神”两点。在中国新闻史上，可以说是最富青春气息的一页。除了天津《大公报》，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新企业。在我心目中，《大公报》不免带点绅士气分，《立报》就够年轻人的冲劲了！因此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望平街气象一新，而领导新的望平街的工作者，很多是《立报》旧人。只是这位创建《立报》的斗士，倒退到台湾去了。

本来，《立报》是别人的事业，和我并不相干；我和成氏也并不相识，直到二十多年前，我南来香港，才和他有一面之缘。但，我和《立报》关系之密切，不仅在《申报》之上，也在《民国日报》、《社会日报》之上。一开头，《立报》的三副刊之一《言林》，由谢六逸兄主编，谢兄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，我便成为《言林》的基本作稿人。我们的步调便和《文学》、《太白》、《芒种》、《自由谈》相一致，却更富有战斗性。接着，严谔声兄要我帮忙他所主编的副刊，而萨空了兄也在主编《小茶馆》。抗战军兴，“八一三”淞沪战役中，我随军到了闸北战场，便白天替曾虚白兄的《大晚报》写战讯，晚间替《立报》写军事新闻；那三个月中，占了七十多天的头条地步。这一来，我和萨兄便有了深切的交谊。成氏和萨兄、严兄，可以说是《立报》的三杰，我所交

往的正是《立报》的灵魂。成氏说到抗战期中，《立报》销数达到二十万份的空前纪录，和我的第一线采访，不无相当关系。后来，《立报》从上海孤岛撤出，在香港复刊；我和云便是《立报》的战地记者。（港版《立报》，初由茅盾兄主编《言林》，仍由萨兄主编《小茶馆》。）那一时期，我和萨兄的友谊，便更进了一步了。后来，成氏任国民参政员，时常到重庆去。萨兄有着远向玉门关大展宏图的打算。（他们对盛世才，还寄以一种幻想。）我还替《立报》写战地通信，直到太平洋战争的到来。（关于我和萨空了兄的交游，下文另有交代，这儿便带住了。）

在香港的《立报》，声光大不如当年在上海初创的日子。到了萨空了兄和成氏分了手，港版《立报》，也日趋暗淡。抗战胜利，大家也都回到上海望平街去。《立报》内容趋于分裂，主要还是政治观点的距离太远。《立报》虽在上海复刊，却变成了潘公展的企业；真正的小型报，由马树礼、宦乡二兄主持的《前线日报》来继续。社方曾邀我主编《言林》，我觉得泄了气的啤酒，太乏味了。《立报》的股业，由潘氏承担，原来的股东，都有了收获，也和我们不相干的。关于报社若干内幕，连成氏都不敢直白说出来，我更不必理别人的闲事了。

成氏的追记中，说到一位《立报》伙伴吴中一先生。这位常州青年，他是一位裁缝的儿子，只受过初中教育，却在成氏于南京办《民生报》时，显出勤劳工作、忠于记者职守的才能。成氏在上海创办《立报》，首先获得他的鼓励，还认了五千元的股金。本来，投资这种企业，带点冒险性，他的信心，却比成氏还坚定些。《立报》的成功，也可说是这一种信心所撑持出来的，他几乎把一生心力都贡献给这一份小型报的。我们听了有关吴氏的故事，仿佛读《纽约时报》老板亚道夫·奥克士的历史（他是从报童出身的新闻记者）。我们承认《立报》所培植出来的进步记者，不在《大公报》之下呢！（这句话，成舍我先生不曾说过。）